

MINQI O SHIQI DE LIUYANG WENREN

民国时期 留洋文人

邹雨青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 留洋文人

邹雨青

邹雨青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的留洋文人 / 邹雨青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34 - 6910 - 7

I. ①民… II. ①邹… III. ①文化 -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民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7473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1 字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言

去年8月，我乘飞机赴台湾交换学习。飞机从南京起飞，不断升高，穿破云层。机舱里的乘客有的睡觉，有的谈天，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飞机开始降落，随后安全抵达台北桃园机场。

我在乘机时，闲来无事便看起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其中有一段描写方鸿渐从法国回国时乘坐邮轮的情景描写：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

这我不禁感慨，1937年的留学，和今天的留学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啊。我们今天，乘坐十几小时的飞机可以从北京到西雅图；而民国时期的留洋文人远赴异国求学，需要乘坐几个月的渡轮，经历海浪颠簸的辛苦，随时会有遇到海难的危险，而与国内的亲人朋友音讯全无。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为何他们甘受如此之艰辛赴异国求学？支持他们这样做的信念和动力又是什么？……

而后在台师大交换学习的经历中，以及之前在美国短暂的十几天交流生活中，我深刻体会了留学对于我个人开阔眼界、更新思想的重要性。这时我开始对中国的留学历程产生兴趣，并对我一贯崇拜的那些民国文人的留学生涯关注起来。

中国人出国留学，若从1847年容闳赴美算起，至今已有168年的历史；若从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也长达143年。100多年来，中国人出国留学从涓涓细流到洪波巨浪，曾经跌宕起伏、几起几落，折射出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足迹。

1847年，当容闳随着美国传教士赴美留学的时候，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那时，国人对海外世界因茫然无知而充满恐惧，出国留学更属史无前例。出门在外者，未来命运如何走向、是祸是福，难以预料。而容闳在外国传教士的资助下，毅然赴美求学，最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但容闳当时的感想，与其说以自己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自豪，还不如说是因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痛楚。这种痛楚是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沮丧和苦恼。他回国后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使更多的中国青年像他一样出国留学，将西方的学术文化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若干年后，他的多方努力终于促成清政府同意选派官费留学生。

清政府最初选派的留美学生是120名幼童。这次虽然是政府官派，但当时国人风气未开，上层富家子弟仍然沉湎于考科举、入仕途，以至于费了很大周折才凑足120名留学候选名额。应选者大都是贫寒子弟。清政府要求这些出洋幼童的父母在保证书上画押，同意“疾病生死，各安天命”。试想，当时大户人家谁肯将自己的子弟送上这样一条不明生死的出国之途呢！由此也可见

当时中国朝野视出国留学为畏途的情形。

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但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说，这120名留美幼童又仿佛是过早开放的花蕾，因为缺乏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最终沦为夭折的境地。由于清政府的顽固守旧，担心出国幼童适异忘本、沾染外洋恶习而离经叛道，遂将幼童中途撤回。

其后，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但当时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只让他们学习一些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制船造炮之类的技术工艺，回国后也只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技术工匠使用；不仅不鼓励，反而反对出国留学生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更无意将他们训练成改造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新型人才。在20世纪以前，中国国势虽已衰颓不堪，而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回国留学生甚至不能加入正途士大夫行列，而处于边缘位置。他们之中后来虽然涌现出了著名的思想家严复以及像詹天佑等少数著名的工程师，但这不过是清政府“种豆得瓜”的结果。就总体而言，这一代留学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的。

留学生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是20世纪最初20年间的事。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在全国推行一系列“新政”。其中之一是废科举、兴学校，奖励出国留学。在政府的倡导下，青年学子纷纷买舟出国。一时间，中华大地迅速掀起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留学生也从此时来运转。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留学国主要是日本，留日学生占出国留学人数的90%以上。究其原因，是留学日本“路近，费省，文同”。这个时期，留学专业多集中于政治、法律等学科。留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极强，许多人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民国建立后，他们又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但这一代留学生的专业造诣有限，不少人刚刚步出私塾书院之门便踏上了出洋渡海之舟，出国后大多只接受到粗浅的初等教育，真正进入外国大学学习的极少。

20 世纪初期，中国大多数士民对本国的制度和文化已开始丧失信心，对西方文化由自卑而衍生景仰之心。这种景仰很快转化为崇尚留洋归来的学子。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留学是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捷径，留学生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只要翻开那时的报刊书籍，这样的言论触目可见，“留学生者，20 世纪最美之词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强国之原素也……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 20 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最崇洋的时期，也是留学生地位最崇高的时期。那时，一位留洋归国学生可真是说一不二。像胡适那样二十六七岁还没有正式拿到博士学位即可问鼎北大者，甚至傲视士林者，比比皆是。许地山的小说《三博士》中的主人公说：“留洋归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这虽然是小说中的一句戏言，也未尝不是那时归国留学生的真实写照。

论留学生的质量，“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堪称是真正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一代。在留学地域上，这一时期留学日本者虽仍很多，而留美、留欧者亦复不少；在留学专业上，比前两代留学生有较大拓展，不再集中和偏重于某一方面；在知识结构上，这一代留学生一方面秉承了丰厚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与前两代出洋学子相比，他们的“西学”程度要深，而与以后几代留学生相比，他们的“国学”根基要厚。他们在蒙童时代受过严格的私塾书院教育，出国之后，又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西学”的训练。故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担当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角色。

到 30 年代，中国留学教育已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随着国内新式教育的逐步发展，出国留学生的教育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出国留学生多数能直接插入国外大学高年级或考入研究

院学习，而且大多学有专攻，获得国外硕士、博士学位者颇不乏人。

但也大约从30年代开始，国人对留学教育提出批评和反省。一些人认为留学教育在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酿成了某些缺失。当时一些人对留学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教育和学术的拿来主义，责备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现炒现卖，而不能结合中国的国情、联系中国的实际，建立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和学术，认为中国教育和学术长期滞留于模仿阶段。不过，这些批评并没有影响留学教育的继续发展，归国留学生依然炙手可热，成为各方争相网罗的对象。

抗战时期，留学教育因受战争的影响而一度中断。战后虽一度复原，但未久又因东西方冷战，使新中国的留学教育遭受重大挫折。50年代，中国人留学区域局限于苏联，兼及东欧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留学交流完全中断。留学专业重工轻文，主要学习冶金、采矿、地质、电气、建筑、水利、农业和交通等。另外，这个时期自费留学中断，留学生全部由国家统一派遣、管理和分配。留学生自己不能自由选择留学国家和留学专业。选派留学生时，更注重其政治出身和政治素质。其后“文革”十年，中国留学教育几乎完全中断，归国留学生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直至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对出国留学做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指示，中国的留学教育才随着时代大潮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78年至今，是中国留学教育的鼎盛期。在中国留学史上，这个时期是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留学地域最广、留学专业门类最全、国家对留学教育最为重视的时期。在此期间，出国留学人数逐年递增，留学地域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专业几乎涵盖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观之，留学具有双赢效应，即无论对留学派遣国，还是对留学接受国，均有益无弊。

与改革开放最初数年相比，当今中国的留学教育政策已日趋规范化、法制化。步入 21 世纪后，人类接受教育的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扩展，不仅高等教育日趋国际化，甚至中等和初等教育也将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我在国内大学两年的经历中发现，在一些老师的课堂上，仍旧固步自封地排斥国外的新观念和新思想，使用的教材陈旧不堪、没有新意……这样执意地将固执和陈腐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我觉得是很可惜的。萨特在《寄语海狸》中写道：“从锁孔里看世界，生活在煎锅中。”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应该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开阔视野，令自己跳出惯性的思维模式、脱离固有的偏狭一隅，以便开放国内的学风。

然而，现今的留学亦存在一些弊端。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自费留学成为留学的主流，大众留学时代来临。无论是相对于以前的哪个时代，留学的意义更加指向个人，而不是国家、民族。“20 多年前的留学，更多的是公派留学，是一种不充分竞争下的、无奈的精英留学；而今天的留学，变成了全民留学、大众留学，人们有选择的自主留学。”有人精练地总结当下留学的三个目的：获得就业竞争力、获得行业竞争力、引领和启发社会的能力。其中，第三个目标是体现出深刻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是占最小比重的。

钱理群教授这样说：“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当我在考虑出国留学时，我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个人及家庭的利益赢得，这点我承认。“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难道不也是我们自己吗？

现在很少听到有人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的字句，相反，我听到老师在课堂上这样与我们讲：“我教育我的女儿好好读书，因为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不至落入社会的最底层；而社会最低阶层往往是社会问题聚集的地方。”这让我感慨，连教育者都是以这样的利己导向教育后辈，后辈怎能超越自我，认识到对整个社会乃至世界的责任感呢？所以我觉得，当今的留学热中，最难解的弊病就在此处。正如陈丹青在《海归的羞耻与责任》中指出的“社会理想、责任感和道义精神”成了“绝响”。

这本书是“集众家之所成”的结果。在正文后所附的书目，是我主要的参考资料来源；另外还引用了10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和学者、评论家的语段，在此就不列举全部了。在对于某些人物评价、轶事经历等具有争议之处，我加入的一些一己之见，或许有不成熟和有欠客观的地方，还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另外，我在本书中穿插了一些教育心理的原理、启示，通过教育学、心理学的经验和方法分析留洋文人的早期教育经历、留学对个人的影响及其与日后取得成就的关系，是我认为写作本书的一大价值所在。我采取“纪传体”所写的26位文人，将时间跨度设定在从幼年到人生后期；将大多数重点记叙、论述了其幼年、青年时期所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出国留学时受到的新式文化和思想观念，学成归来后由之前所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出国留学教育的影响而后所做的在其相应领域的成就等。虽然题目定为《民国时期的留洋文人》，强调“留洋”，但并未将过多笔墨酌于各个文人在出国生涯中的衣食住行、交游受教等各方面的冗长记叙中。我只是择取了文人出国留学时反映其思想、观念变化的部分，并对其做了一些浅层次的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相关的分析；同时加以幼儿、青年时期的经历（这些经历是如何塑造此人的性格、人格的？这些受教经历是怎样潜移默化地促进其留学的想法的？）和学成后取得的种种成绩（出国留学经历让

他/她原先的思想产生怎样的变化？他/她又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思索前行的？)。

最后，感谢家人的支持和鼓励，这是我做好一切事情的最根本动力；感谢小学作文班的张建军老师，他从不设单一命题、鼓励我们自由发挥想象的作文教授方法，让我产生对写作和阅读的兴趣；感谢我在扬州中学遇到的知己和朋友，常常站在校园里的某处投缘地倾谈理想、激烈地辩论看法，让我始终觉得思考是一件美好的事；感谢文科班的同桌杭婧，在校时我们互相用言语激励，上大学后仍然通过书信共勉，提醒我不忘初心。最要感谢的是编辑薛媛媛女士，若非有您的赏识和推荐，我可能还在投递文稿的过程中寻找与摸索。

2015年8月28日

邹雨青于扬州

目 录

序 言	邹雨青 1
辜鸿铭	
“清末怪杰”	1
蔡元培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5
李叔同	
“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	29
鲁 迅	
国土无双	42
陈衡哲	
新时代的造命女性	55
胡 适	
尝试白话文的风雅先生	70
苏雪林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83
梁实秋	
雅舍中笑谈世事人情	95
吴贻芳	
智慧女神的“厚生”哲学	107
陈鹤琴	
“一生为童稚”	118
郁达夫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129

徐志摩	
在康桥的惊鸿一瞥	142
金岳霖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虚”	152
林语堂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163
朱自清	
“性缓佩弦犹可急”	176
周厚枢	
“知负笈尽多俊秀，更幼儿淑女兼收”	189
朱光潜	
以东西方诗文谈美者	206
宗白华	
赏介中国古典文化之美	218
冯友兰	
“冯闾雅趣竟如何”	230
赵元任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240
冰 心	
心有琉璃色如雪	250
巴 金	
激烈的反抗者与诚挚的忏悔者	260
张若名	
“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绿波”	272
傅 雷	
“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 ...	282
钱锺书	
“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	293
季羨林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304
主要参考书目	317

辜鸿铭

“清末怪杰”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为 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等英文书籍。辜氏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他曾这样概述自己的一生：“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南洋华侨家庭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檳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的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

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兼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让他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作为移居南洋远离中国本土的华侨，辜鸿铭父辈的传统文化意识极强，每逢家族祭祖，其父都会正告辜鸿铭：“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说：“要格外重视儿童的精神的形成，而且须及早形成，这足以影响他们今后一生的生活。”这种自幼得到强化的爱国精神，无形中对塑造其日后的保守主义、尊崇孔孟的文化观有重要影响。远离故土的辜氏家族寄居在南洋一隅，尽管声势显赫，却也难掩乡土之思，离土境况及思乡之情只有固化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和习俗加以捍卫。虽侨居南洋百年，但辜氏家族仍使用中国本国的“闽南汉语”，不改乡音。但也恰恰是这种家族式的、世代相传的对祖先及中华文化的尊崇，使年幼的辜鸿铭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保守主义文化的思想因子。

乔迁英国，苦学语言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这个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课余，布朗教辜鸿铭学德语。布朗的教法类似中国私塾的填

鸭式教育——背诵《浮士德》。布朗对辜鸿铭说：“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布朗总是比比画画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他的动作背诵。年幼的辜鸿铭并不懂其意，很想知道《浮士德》讲的是什么，但布朗不讲，说：“只求你说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时我再讲给你听。”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布朗为辜鸿铭定下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鉴于辜鸿铭背得快、领会得深，计划又改为半个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 37 部戏剧都背熟了。

布朗的这种教学法令我想到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学说（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最近发展区是指，由儿童独立地解决问题所决定的当前发展水平和儿童在成人指导下能达到的发展水平之间的一个区间。根据其理论，在发展的任何一点，儿童都可能处于能解决问题的边缘状态，需要的只是一些结构、线索、暗示、回忆细节或步骤的帮助、继续尝试的鼓励等。教学应符合学生的能力、水平，使其获得“跳一跳就够着”的知识，布朗便是遵循这一原则：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不教已会的，不教太难的；通过示范、指点设置“支架”，实行支架式教学，令学生在学习中富有能动性地摸索和体悟。

13 个博士学位

1870 年，14 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于 1872 年回到英国后，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

得到校长（兼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先生的赏识，专修英国文学，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修辞学等。因为难，辜鸿铭在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时不知哭了多少次。但他不放弃，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文、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多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增大，渐渐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回忆：“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到后来，不仅希腊文、拉丁文，即如法、俄、意等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触类旁通，一学就会。

1877年4月，20岁的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会讲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其《京华烟云》一书中便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

浪漫与保守

辜鸿铭在读书期间，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上，人们狭隘地将浪漫主义思潮理解为只盛行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文化潮流；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社会观，是一种针对当时时弊——“理性破灭”而提出的补救社会的解决办法。浪漫主义思